

• 政治学研究 •

从街头到议场： 台湾“时代力量”的发展历程分析

林 冈, 白 玉

(上海交通大学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上海 200030)

摘要: 2016年台湾地区选举中,“时代力量”作为新成立的政党在立法机构中获得五个席位,实现了从街头抗争到议场议事的转变。时代力量是“太阳花学运”的产物,代表了台湾社会的一股声音,其产生和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社会运动理论的三大流派分别从政治机会结构、文化框架和组织动员三个维度为分析时代力量提供了合适的理论框架。时代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基于台湾贫富差距拉大、马英九当局执政满意度降低、“台独”、“反中”情绪的蔓延以及网络媒介的发展这四种因素的交互作用。追踪时代力量的产生和发展,有助于认识时代力量的基本特点及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瓶颈。

关键词: 时代力量 “太阳花学运”; 过程追踪; 台湾

中图分类号: D67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17)02-0098-07

在2016年“二合一”选举中,蔡英文以56.12%的得票率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其所领导的民进党亦获得60%的席位,成为立法机构内第一大党。国民党候选人朱立伦则只获得30.04%的得票率,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也只剩35个,不足三分之一。除此之外,“时代力量”和亲民党分别获得5个和3个席位,进入了立法机构。从这次选举,我们不仅看到了台湾地区政治生态的蓝绿逆转,而且注意到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一股新绿势力的成长。“时代力量”是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出现的一个政治团体。2014年3月18日,台湾地区围绕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的争议,引爆了“太阳花学运”,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社运人士占领立法机构长达21天,一时间

“反中”、“反马”、“反服贸”三种声音相互交织,愈演愈烈。“学运”结束后,“岛国前进”、“时代力量”、“社会民主党”等一批新团体纷纷涌现,他们积极涉入政治和公共事务。“太阳花学运”俨然成为时代力量产生的催化剂和导火索。事实上,时代力量的产生以至登上政治议场,乃是台湾社会各种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

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近来西方社会运动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文化框架(cultural framing)和组织动员(mobilization)。政治机会结构研究社运人士如

收稿日期:2016-12-10

作者简介:林冈(1953—),男,福建福州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两岸协创中心专家委员;白玉,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委智库内涵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何利用既有的政治局势以实现其运动目标;文化框架研究社会运动的诉求,考察社运人士如何在规范的意义正当化他们的行动;组织动员则是探讨哪些人、透过何种管道参与社运。^{[1](P351)}一场成功的社会运动离不开有利的政治机会、合理的诉求和有效的组织动员。

政党组织是一系列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研究某一政党需要将其放入特定的脉络中。比较历史分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其特点是关注大范围且往往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复杂结果,强调以经验为基础的深度案例研究,考量过程和时间维度。^{[2](P3)}因其重在解决真实世界的难题,所以通常要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度的过程分析,这就需要对历史有足够的了解。然而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学家的叙事分析不同,不拘泥于对历史事件的简单描述,而是希望在对个案进行深度理解的基础上得出更一般的因果推论。因此,比较历史分析属于宏观层次的分析视角,其最主要的方法

就是过程追踪,即检视一个过程的中间步骤,推论过程如何产生及其是否且如何产生预期结果的假说。^{[3](P6)}在这一分析方法中,序列(sequence)是指在一个特定脉络中发生的有时间顺序的事件的集合,而过程(process)则属于一个特定类型的序列。社会运动的再生产过程(self-reproducing process)可以细化为连续(continuous)、自我扩张(self-amplifying)和自我消耗(self-eroding)过程。^[4]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某一结果并不是由单一的原因所导致,而是多种因素的复杂结果。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不同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何导致某一结果的产生。

借鉴上述理论与分析视角,本文认为台湾时代力量的产生是多种复杂因素的结果,并不能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因此,通过过程追踪来解释时代力量是如何在政治机会结构、论述框架和媒体动员这三个不同的、随时间不断发展的过程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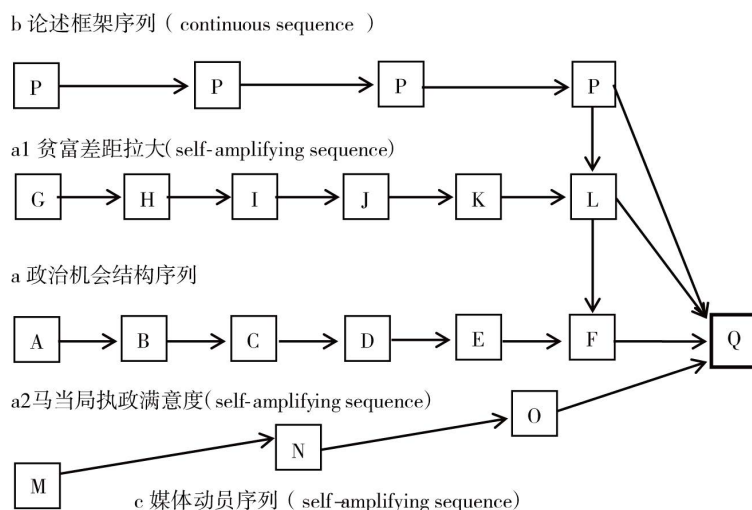


图1 时代力量产生的过程追踪

- 注: A. 野草莓运动 B. 八八水灾 C. 塑化剂事件 D. 洪仲丘案 E. 九月政争
 F. 太阳花学运 G. 自由化 H. 台商赴陆 I. 加入 WTO J. 签订 ECFA
 K. 贫富差距拉大 L. 服贸争议 M. BBS N. MSN O. Facebook/Line
 P. “台独”、“反中”情绪 Q. 时代力量成立
- 来源: 作者自绘

二、时代力量产生的过程追踪

(一) 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马当局执政满意度降低为时代力量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机会在社会运动研究中,最早提出政治机会这

一概念的是艾辛杰(Eisinger 1973)。他通过对美国 40 多个城市中的抗议活动的比较,发现抗议的发生与一个城市的政治机会结构有关系,并将其界定为“群体能够接触权力和操控体制的程度”。^[5]后来在塔罗(Tarrow 1988)的倡导下,政治机会结构变成一个专门的理论。然而,

对“政治机会结构”这一概念的内涵及其适用范围该如何界定,学者们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在实际分析中难免随研究者的喜好而变化。一方面,以甘姆森和迈耶尔为代表的学者强调“机会”,他们认为只要对社会运动有利,任何因素(包括文化方面的内容)都可以被纳入这一概念范畴,进而提出囊括各种相关因素的“文化型—制度型×稳定型—变异型”分析框架。^[6]另一方面,以麦克亚当、塔罗和蒂利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政治机会结构”概念应该严格限制在“政治”范畴内。

本文将政治机会结构理解为各种有利于时代力量产生的机会和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台湾贫富差距扩大和马英九当局的执政能力低下,由此引发民众的普遍不满。由于台湾社会期盼改变现状,时代力量作为一股新的力量应运而生。但政治机会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变化的过程。正如麦克亚当所言,我们不应当将政治机会结构变化视作短期剧变,而应当考察历时的政治机会结构变迁给内生组织、内生网络提供的成长空间和其中的集体意识的酝酿过程。^[7]因此,本文将贫富差距和马当局执政满意度分别视为两个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过程,利用过程追踪法来描述它们是如何随时间而发展变化的。

首先,台湾贫富差距日益恶化为时代力量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政治机会(如图1序列a1)。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始,台湾逐渐解除管制并开放市场,然而自由竞争的逻辑本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再加上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金钱与政治权力的不当结合使得政府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利益,于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年轻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面对这一问题,政府诉诸“增长”而不是“分配”手段,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FTA),进一步实现经济自由化和国际化。

台湾采取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以对外贸易和投资为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在台湾的对外贸易中,与大陆贸易所占比重逐年增加。特别是马英九执政以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大环境下,两岸经贸交流日益密切,中国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台商赴陆投资设厂早从90年代就开始了,即使是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台商赴陆投资的热度依旧不减。这源于两岸产业的互补性,大陆廉价的土地、劳动力成本以及各项优惠措施对台商的吸引力。2010年6月29日《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签署,标志着两岸经贸进入制度化阶段。然而,由于马当局未能妥善处理分配问题,两岸经贸红利多为少数人享有,再加上两岸关系本身的特殊性,在反对党的鼓吹下,普通民众将造成台湾贫富分化的原因错误地归咎于两岸经济整合。于是当立法机构审议两岸服贸协议时产生巨大争议,并最终引发以“反服贸”为主要诉求的“太阳花学运”。

其次,马当局执政能力受到党内、党际矛盾的制约,无力解决诸多社会问题,也为时代力量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机会(如图1序列a2)。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马英九高票当选。鉴于民进党执政时期台湾经济低迷以及扁家弊案丛生,台湾人民赋予马英九当局极高的期待,希望新的执政团队可以解决台湾社会存在的问题。然而马英九执政后的表现不如人意。2008年马英九刚上任即爆发“野草莓运动”,台湾社运人士以静坐及游行示威方式表达对当局的不满。随后,当局在“八·八”水灾中救灾不力,导致马英九的民意支持度第一次大幅滑落。TVBS民调显示,“八·八”水灾后,民众对马的施政满意度仅剩16%。^[8]此外,自2011年以来台湾相继爆发塑化剂、毒牛奶、黑心食用油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2013年洪仲丘死亡案引发的规模罕见的白衫军运动,也进一步影响了民众对马当局的信任度。同年9月,马英九对同属于国民党的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做出党纪处分,撤销其党籍。虽然“马王政争”的深层原因是台湾立法机构不配合行政部的政策,法案的通过率不如预期,^[9]但是这一做法严重影响了民众对马英九的信任度。

(二)“台独”、“反中”情绪的长期存在为时代力量的出现提供了合适的论述框架

在台湾社会“台独”思想最早源于国民党迁台后威权统治下的“省籍—族群”之分。其后随着民主转型,特别是在李登辉和陈水扁的竭力

鼓吹下，“台湾主体意识”逐渐抬头。民进党的修改课纲等一系列“去中国化”教育，为“台独”思想提供了深厚的政治土壤。台湾政党体系也逐渐形成以国民党为主的“泛蓝”与以民进党为主的“泛绿”两大阵营，“统”“独”议题成为政党政治竞争的主轴。需要指出的是“台独”与“反中”情绪是有区别的。“台独”是传统深绿团体的主要诉求，其成员不少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时期受难者及其家属。深绿团体所连结的群众多半是具有类似经验的人士或其亲友、后辈，这批人占台湾总人口的比例不高，在世代上以年长者居多。而年轻世代的“反中”在较大程度上是由于贫富差距扩大、代际不公和经济成果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论述框架是指运动参与者提出政治诉求，使其行动正当化，在群体内得到认同，并获得群体外的同情，以吸引更多的外部成员的支持和加入。社会运动研究者们认为，论述框架能否成功发挥动员效果的关键，在于能够引发听众共鸣(resonance)。^[10]事实上，框架的构造过程涉及策略性的成分，充满了各种隐藏、伪装、占有的权力运作，即使只是为了凝聚运动群体内部的共识，也是如此。因而 McAdam 等人提出了策略性构框(strategic framing)的概念。他们认为构框可以被定义为“一群人有意意识的、策略性的尝试，形成关于世界与他们自己的共同理解，以正当化与鼓舞集体行动。”^[11]

在台湾，“台独”或“反中”情绪属于一种持续的序列(continuous sequence)(如图1序列b)。时代力量本身既代表传统深绿团体的诉求，也利用“反中”情绪进行构框，以尽可能争取更多群体的支持和参与。为此，时代力量将“推动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作为党纲，并表示将力促“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推动全方位“宪政改革”、废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活动和加入国际组织等。黄国昌公开表示，许多年轻的新世代早已成为“天然独”，“追求台湾国家正常化”是时代力量的创党DNA。^[12]此外，时代力量提出的多项议题主张均有浓厚的“台独”色彩，诸如将“两国论”纳入其党版监督条例草案、提议删除“台湾国贴纸条款”等。

(三) 网络媒介是时代力量重要的组织动员方式

传统社会运动的主要动员方式是人际网络，社会运动的参与者间的过往生命经验有较多的重合。而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网络媒介对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与组织形态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大。正如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所言：“直到今天，所有的运动(或许是所有的政治)面临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便是对大众媒介的依赖。”^[13]

网络媒介在发起运动、散播与更新运动信息、动员群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野草莓运动是第一个利用网络BBS发起的运动，他们组织参与者利用BBS进行讨论，甚至提供视频使网络参与者随时了解活动情形。此外，野草莓运动的部落格与BBS还大量发出的声明稿与新闻稿，甚至进行部分运动走向的讨论。在野草莓运动中，网络媒介的重要性展露无遗。^[14]

“太阳花学运”也充分利用网络的力量进行宣传 and 动员。首批进入议场的学生利用Facebook对会场内的情况进行实时直播，之后他们专门设立“网络组”，上传运动的全天候画面，通过网络使外界随时了解运动情况。在网络媒介的动员下，参与学运的人数很快就达到了最大化。

时代力量也采用了网络媒介进行动员。他们创建了Facebook，内容包含其创党理念与宗旨、历次活动、政策主张以及对于特定议题的讨论等等。其创党人林峰正表示，时代力量不管是党内干部、区域“立委”提名人、不分区“立委”名单，都将开放网络投票，交给党员决定。^[15]2016年大选，时代力量的三位“立委”候选人黄国昌、林昶佐、洪慈庸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产生。时代力量的动员结构影响了其组织形态。时代力量采取集体领导的组织架构，主席团成员由党员通过网络直接选出7名，加上4名政策委员会委员和4名工作委员会委员。与传统的科层组织相比，这种较为扁平的组织形态更有利于吸引年轻人的加入。林峰正表示，“过去少数精英决策的参政模式已经不符时代潮流”，时代力量将是一个透明、开放、参与、行动的政党。^[16]

三、时代力量的发展历程及其可能走向

时代力量是在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马当局执政满意度每况愈下的背景下,适应人们寻求新的政治力量来改变社会现状的意愿而产生的。然而其能够成功地从街头走向议会,离不开有效的诉求和组织动员。在了解了时代力量产生的原因之后,本文接下来探讨时代力量的政党属性,其在台湾政治舞台所扮演的角色和未来前景。在回答这些问题前,需要对时代力量的发展过程进行梳理,而过程追踪法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工具。Pierson 就曾经呼吁全面探讨随时间而展现的过程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17]

(一) 时代力量的发展路径分析

时代力量由闪亮乐团主唱林昶佐以及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前执行长林峰正等人于 2015 年 1 月 25 日成立。从成立到进入立法机构的一年多时间里,时代力量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政策主张,本文按照时间顺序将这些议题整理成表 1。

表 1 时代力量的发展历程

时间	议题
2016. 2. 19	提出党版政权交接条例,提议领导人可提前卸任
2016. 3. 1	时代力量将“两国论”纳入党版监督条例
2016. 3. 8	时代力量公布党版“不当党产条例”,制定“吹哨者保护奖励”条款
2016. 3. 15	时代力量提出将修法降低罢免门槛
2016. 3. 16	时代力量林昶佐提案将“侨委会”整并进“外交部”,同时用“台侨”取代“华侨”
2016. 3. 22	时代力量提出党版的《公民投票法修正草案》
2016. 4. 3	时代力量发起人要党内民代表表态:要不要废除死刑
2016. 4. 6	时代力量提案删除“台湾国贴纸条款”
2016. 4. 19	针对跨国诈骗时代力量提修法:侦办境外犯罪不再只限重罪
2016. 4. 29	时代力量推 26k 最低工资法
2016. 5. 5	时代力量提案将医师纳劳基法
2016. 5. 10	时代力量提案:要求新政府参与 WHA 应拒“一中原则”

资料来源:根据风传媒报道整理, <http://www.storm.mg/category/k23558>, 2016-06-03.

我们从时代力量提出的政策主张以及其关注的议题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

首先,在意识形态上,时代力量逐渐变为一个以台湾“独立”为主要诉求的政党。作为同一批产生于“太阳花学运”之后的政党和政治团体,在成立之初,时代力量并没有像“基进侧翼”一样明确提出“台独”主张,甚至也不像“岛国前进”那样有明显的“台独”倾向。然而进入立法机构之后,时代力量的提案和政策主张越来越有明显的“台独”色彩。比如:时代力量将推动“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作为党纲,提出将“两国论”纳入党版监督条例草案。其“立委”林昶佐曾提案希望将台湾“侨委会”整并进“外交部”,同时将华侨定义为“台侨”。林用“台侨”取代华侨的最大目的就是宣传他的“台独”理论。

其次,反马、反国民党仍然是其主要的政治主张。时代力量进入立法机构后先是提出“党版政权交接条例”,鼓吹领导人要提前卸任。接着公布党版“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财产处理条例”草案,制定“吹哨者保护与奖励”条款,规定若第 3 人愿意揭露不当党产之所在,得酌予奖励。然后提出修改“选罢法”,将罢免门槛三分之二改为简单多数。这些做法无疑都是针对马当局和国民党的。

再次,就与民进党的关系而言,时代力量逐渐成为民进党的侧翼。在成立之初,时代力量也曾标榜反对政党恶斗,要作为第三势力对国、民两党进行监督。然而随着大选的临近,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联结也越来越清楚。在选举中,时代力量作为民进党的侧翼打选战,不仅得到蔡英文、陈建仁的辅选,黄国昌也跨区为民进党候选人助选。而得到民进党的支持和奥援是时代力量突破 5% 政党门槛的关键。进入议场后,时代力量更是配合民进党通过“不当党产处理条例”,企图从资源上解构国民党。这些注定了时代力量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第三势力政党。

最后,时代力量的议事能力仍然很欠缺。作为一个诞生于社会运动的政党,时代力量在实现从街头到议场的目的之后,仍然保留社会运动的习性,例如他们会在立法机构内选择以

咆哮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另外,时代力量的某些政策主张前后不一。在成立之初,时代力量成员曾明确提出希望废除死刑,然而内湖女童案发生之后,时代力量的“立委”立刻否认曾建议废除死刑。

(二) 未来时代力量可能的发展路径

通过以上对时代力量成立一年来的发展过程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认为未来时代力量大致有三种可能的发展途径:

可能性1:时代力量党影响力逐渐增大,不但成为第三大党,甚至挑战两党体系,沿着一种自我扩张(*self-amplifying sequence*)的路径发展;可能性2:时代力量的影响力保持不变,作为国民两大党之外的第三个小党而持续(*continuous sequence*)存在;可能性3:时代力量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甚至走向泡沫化,沿着自我消耗(*self-eroding sequence*)的路径发展。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下,台湾政坛仍然以国、民两大党为基础,时代力量作为一个小党在既有的制度结构下将很难发展起来。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竞争的主轴逐渐由“统”、“独”议题转向“左”、“右”议题,为了赢得选举,台湾主要政党可能向中间靠拢,提出的政策主张也开始聚焦于台湾的社会经济问题,“台独”主张已经越来越背离台湾的主流论述。时代力量若是坚持“台独”,将会很难赢得更多的支持者。因此时代力量想要沿着自我扩张路径发展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时代力量想作为台湾立法机构恒常的监督者(可能性2),就需要跳脱于蓝绿之外,成为真正的第三党。然而,一方面,时代力量与民进党的渊源太深,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得到了民进党很多的帮助和支持,因此从政党倾向性上来讲,时代力量会更倾向于民进党;另一方面,当前时代力量的主体性并不明显,其提出的多项议题,比如政权交接、立法机构改革、“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等,都与民进党很相似。除此之外,无论是时代力量社运式的参政方式,还是在一些重要议题上左右摇摆的态度,都让人们感觉它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负责任的政党。未来如果时代力量不能很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那么它很有可能成为台联党的“年轻版”,最终也难以摆脱泡沫化的命运(可能性3)。

以时代力量为代表的新社运团体是台湾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累积到一定时刻的必然产物。而时代力量最终能够从街头走向议会,除了它自身的特性及独特的组织动员方式外,最重要的是离不开民进党的支持,而这是与其同时期产生并投入选举的社会民主党所不具备的。因此,台湾目前并没有第三党独立成长的空间和土壤,时代力量的兴起路径也是不可复制的。

如果说“太阳花学运”的爆发意味着台湾一股新兴势力的产生,他们以年轻世代为主力,更加关注公平正义,以更加负责的态度参与政治,那么,从对时代力量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期许。

在当前的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下,时代力量很难挑战以国、民两党为主的政党体系,而且由于其越来越浓的“台独”倾向,即使是对执政的民进党来说它也并不是一个好的同盟者。有观点认为,时代力量的“台独”主张不是“角色扮演”,亦非跟小英扮演黑白脸,而是政治信仰的真情流露。当扮演两岸政策监督者时,他们要的不仅是煞车的角色,更是推翻赛局的破坏者。^[18]在未来,如果时代力量在“台独”的路线上一意孤行、越走越远,必然会失去台湾民众的支持,而且也会危害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最终遭到台湾人民的抛弃。

参考文献:

- [1] 何明修. 社会运动 [A]. 王振寰, 瞿海源主编, 社会学与台湾社会 [C]. 台北: 远流图书公司, 2009.
- [2] Kathleen Thelen and James Mahoney,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Science”,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
- [3]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Process Tracing: From philosophical roots to best practices”, in Andrew Bennett and Jeffrey T. Checkel, eds., *Process Tracing: From Metaphor to Analytic Too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6.
- [4] Tulia G. Falleti and James Mahoney, “The Compar-

- tive Sequential Method”, in 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Advances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Analysi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12-213.
- [5] P. K. Eisinger, *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7, 1973, pp. 11-28.
- [6] 朱海忠. 西方“政治机会结构”理论述评 [J]. 国外社会科学, 2011, (6).
- [7] 杨灵. 社会运动的政治过程——评美国黑人运动的政治过程和发展 (1930—1970) [J]. 社会学研究, 2009, (1).
- [8] 八八究责/民调惨兮兮马施政满意度仅剩 16 趴, 东森新闻, <http://www.nownews.com/n/2009/08/19/883503>, 2009-08-19/2016-06-03.
- [9] 黄宗昊. 台湾地区“马王政争”的制度根源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 2015, (5).
- [10] 何明修. 文化、构框与社会运动 [J]. 台湾社会学刊, 2004, (33).
- [11]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3-6.
- [12] 时代力量提两岸政策: 终结一中架构, 自由时报, <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896395>, 2015-07-09/2016-07-10.
- [13] 任孟山. 政治机会结构、动员结构和框架过程——当代互联网与社会运动的一个分析框架及案例考察 [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1, (6).
- [14] 萧远. 网际网路如何影响社会运动中的动员结构与组织形态? ——以台北野草莓学运为个案研究 [J]. 台湾民主季刊, 2011, (3).
- [15] 时代力量一年内成为台湾第三大党, 为啥?, <https://read01.com/xAygak.html>, 2016-01-17/2016/09/12.
- [16] 孔小惠. 岛内“独派”青年军还是第三势力? 中国台湾网, http://m.haiwainet.cn/ydc/3541355/2016/0125/content_29584246_1.html, 2016-01-25/2016-07-10.
- [17]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54.
- [18] 宋健仁. 时代力量——民进党的同盟军, 蔡英文的绊脚石, 风传媒, <http://www.storm.mg/article/100183>, 2016-04-10/2016-07-12.

责任编辑 王金水

From the Street to the “Congress”: An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aiwan’s “New Power Party”

LIN Gang & BAI Y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China)

Abstract: In the 2016 “election” of China’s Taiwan region “New Power Party”, as a newly established political party, won five seats in the “legislative body”, and completed the shift from a force in street protest to “congress” participation. The “New Power Party” was a product of the “Sunflower Movement”, which represents the voice of part of the Taiwan society.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demand our attention. The three school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have provided proper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us to analyze the “New Power Party” in three dimensions: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cultural framework, organ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were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of four factors: the widening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Taiwan, the lowered satisfaction of Ma Yingjiu’s administration, the spread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anti-China” idea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twork media. Tracking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ew Power Party” can help us understand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future bottleneck in its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e “New Power Party”; “Sunflower Movement”; process tracing; Taiwan